

第6辑

夏中义 主编

大学与人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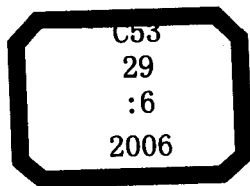
钱理群 巴金和他们那一代人——在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的演讲

施立峻 「鲁迅精神」：家属与传播

夏中义 重读《青春之歌》

何 懿 延安「鲁艺」教育模式解析

朱鸿召 文化论战：为何而战？——《叩问陈独秀》之第四章



大學人文

清園王元化



第 6 輯

DAXUE RENWEN

夏中义 主 编
谢 泳 副主编
邵 建



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学人文. 第6辑 / 夏中义主编. —桂林: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06.12

ISBN 7-5633-6330-0

I. 大… II. 夏… III. 人文科学—高等学校—课外读物 IV. 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43705 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: 541001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om>

出版人: 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桂林金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(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: 541100)

开本: 787 mm × 1 092 mm 1/16

印张: 11 字数: 200 千字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0 001 ~ 4 000 册 定价: 21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目 录
Contents

[独立评论]

- 2 **钱理群** · 巴金和他们那一代人
 ——在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的演讲
- 11 **施立峻**
夏中义 · “鲁迅精神”：家属与传播
- 15 **胡晓明** · 人在何处？
 ——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的演讲
- 22 **刘锋杰** · 论大学之“大”
 ——在苏州大学的演讲
- 36 **孙传钊** · 写在《韦伯论大学》汉译本出版之际

[知识生活]

- 44 **崔卫平** · 经验的年代
- 52 **安希孟** · 科学的世界性与国际性
- 61 **赵 雨** · 读《日瓦戈医生》三题
- 67 **何 懿** · 重读《青春之歌》

[沉 钟]

- 78 **朱鸿召** · 延安“鲁艺”教育模式解析
97 **李新宇** · 文化论战：为何而战？
 ——《叩问陈独秀》之第四章
115 **李文熏** · 殷海光父亲二三事

[观 察]

- 120 **闵艳芸** · 《大学新语文》北大座谈会实录
128 **丁晓萍** · 《大学新语文》教学初探

[新青年]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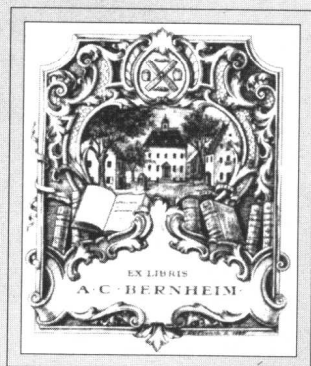
2

大学人文
〔第6辑〕

- 132 **许晨敏** · 凝望那道横眉
 崔卫平 · 听妈妈讲八十年代
 唐 磬
148 **李 扬** · 我来告诉你：“我”是谁
 ——关于“80后”一代的自述
153 **殷小彬** · 以斗士的姿态活着
156 **江小梅** · 流在我心里的父亲的泪
159 **沈灵燕** · 常怀一颗感恩的心

[我的大学]

- 164 **何卫东** · “第三代人”：命名内外的往事
170 编后语暨稿约



[独立评论]

DULI PINGLUN

巴金和他们那一代人

——在北京师范大学春秋学社的演讲

■ 钱理群

2

大学人文「第6辑」

刚才听到同学们朗读巴金的作品，我非常感动，仿佛这位世纪老人又回到了我们中间。这使我想起了正在看的一本书——《西部的家园》，里面收集了北京大学生志愿者到西部农村支教支农写的日记，其中有一篇谈到自己“用双脚去丈量现实”以后，亲身“品味社会的苦难”，感受“乡亲的热情，孩子的质朴”，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巴金老人的理想：“我愿意每一张嘴都有面包，每个家都有住宅，每个小孩都受教育，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。”我想，这是有象征意义的，它不仅说明当代大学生的心是和巴金相通的，而且意味着当中国的年轻一代走向养育自己的大地和人民、直面真实的人生时，就必然和巴金这一代前辈相遇。这种相遇是自有其历史意义的。

这里提出了一个“巴金这一代”的命题。坦白地说，我内心是有矛盾的。同学们可能已经读到我为写的一篇文章，其中谈到了我的忧虑：当我们把巴金看做一个时代的代表，“把巴金瘦小的身体放在这样一个大而空的历史框架里”，我们就有可能“把一个活生生的巴金历史化了，也抽象化、空洞化了”，这就会遮蔽“作为个体的人的巴金”。我这篇文章写于去年巴金百周年诞辰，而现在，当巴老带着百年历史沧桑远离我们而去，联想到这些年一位位曾经给我们带来温暖、力量的前辈纷纷远行，我们又不能不强烈地感受到，一个时代已经结束，我们将独立面对一个新的时代。我想，正是这刻骨铭心的时代感，召唤我们聚集在这里，怀念这位百岁老人，这时候，我们的心目中，巴金又不能不是一个时代的代表和象征。

我想起了朋友传给我的王安忆的悼念文章，她说她在巴金身上看到“五四鲜明的表情”，“这是一个人，一个时代”；“您，你们，一整个五四，就是如此急迫地要将自己献出去，献给你们期许过的乌托邦式的幸福，不惜屈抑和压缩自己，但等发现这种收缩已经伤及你们信奉的理想，猛醒过来，你们便不留情地指向了自

己。您用了一个词‘奴在心者’，说的人和听的人都是极痛的”，但“在您，这理想依然保持着鲜活”。“相比较，我们却好像是倦怠了，不知是急于成熟导致的早衰，还是一——我以为多少还是另有一种时代病症，冷漠在侵蚀我们的性格，我们好像是羞于那么热情了，觉得所有的希望都不免是幼稚的。而只要您在，就可以像一面镜子，照出我们的颓唐”。

是的，面对前辈，是不能不想到我们自己并引发出许多反省的。但这也有危险，即很容易陷入“一代不如一代”的误区。这是应该警惕的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“几乎每一代都不满意于下一代，而且批评的言词都差不多”。比如五四那一代人就批评30年代的青年，说他们不认真读书，又喜欢乱骂人。如今30年代、四五十年代的人成了婆婆、爷爷，对后辈(当代青年)的批评也是一样，也是说他们不读书，好骂人。但有一个事实却是不能否认的：“每代人都被他们上一代所不满，但最后还是接上了上一代的班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，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。”我的结论是：“每一代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，也会有自己的问题，而且最终还是靠他们自己来解决问题。”我想，我们也应该以这样的眼光和态度来看巴金那一代，以及作为后代的我们和他们的关系。

因此，我今天要讲的，就是“巴金那一代人”有什么追求和价值，他们遇到了什么问题，自己又如何来解决。至于对后人有什么启示，这个问题就留给诸位去思考了。

这是有理想、有信念、有信仰并将其化为日常生活的一代人

我还是想从那位青年志愿者所引述的巴金那一段话说起，因为那是集中了巴金的理想、信念以至信仰的。

我们来细心体味这句话：“我愿意每一张嘴都有面包，每个家都有住宅，每个小孩都受教育，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。”

这里没有人们讲到理想时必有的豪言壮语，也没有人们讲到信念、信仰时必有的玄妙、深奥以至神秘，它是如此的普通、朴实、简单、具体，但也许这才是真正的理想、信念与信仰所应有的品质。

它有着丰富的内涵。

首先，它关注的不仅是“面包”、“住宅”，而且有“教育”与“发展”。这使我想起了鲁迅的话：人活在世上，一要生存，二要温饱，三要发展。从社会发展的角度，这几乎可以概括我们通常所说的“现代化”的发展目标。从人的发展的角度，它是直接指向人的从物质到精神的全面的健康、健全发展的。由此形成的是这一代人的精神特征：一方面，国家、人民的贫穷、落后成为他们的“心之痛”，迅速改变“一穷二白”的面貌成为最让他们动心的奋斗目标；另一方面，就个人而言，

他们更注重精神的满足和发展,精神的丰富、崇高和对自由的追求,对他们而言,具有生命终极性的意义。他们身上那种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、乌托邦情结、堂吉珂德气质就是这么产生的。

其次,它强调生活、发展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,而且是“每一张嘴”,“每个家”,“每个人”。这不仅包含了社会民主、平等的观念,更是对人的生命个体的关爱,对所有生命的敬畏。它蕴含着一种生命息息相关的体验,如鲁迅所说,“无穷的远方,无数的人们,都和我有关”,只要有一个生命在贫穷中挣扎,我就是不幸的;只要有一个生命不自由,我就是不自由的。这是一种博爱,一种悲悯,自有一种博大的情怀。因此,这一代人是绝不会把个人的悲欢看做整个世界的,你读他们的作品,接触他们个人,都会感到一个阔大宽广的气象。这可能是最具魅力的。

再次,强调“每个小孩”的受教育权。这也很值得注意。这里不仅包含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历史进化论,更表示了对弱小生命的关爱和同情。我们说过,五四新文化运动有三大发现,即对儿童、妇女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独立价值的发现与肯定。因此,用五四精神培育起来的巴金这一代人,对儿童、妇女、农民、下层人民都有着几乎是天然的亲和力,他们是天生地站在社会弱势群体这一边的。人道主义和平民意识已经渗入血肉,成为这一代人最鲜明的精神特征。

我们说“渗入血肉”,就是说,所有这些理想、信念、信仰,都已经化为他们生命的内在需求,并且具有自我生长力,自然地化做了他们的日常生活伦理,变成一种生活方式,一种生命存在方式。这或许是更加难能可贵的。巴金一再说他不是个文学家,人们总不能理解。其实这正是进入巴金的人与文学世界的一个关键。巴金说:“我不是一个文学家,也不想把小说当作名山事业”,“当初我献身写作时,我充满了信仰和希望”,“我只是把写小说当作我生活的一部分。我在写作中所走的路与我在生活中所走的路是相同的”(《灵魂的呼号——〈轮椅集〉代序》,《我的呼号》)。因此,写作就是他的生活,就是他的生命存在方式,而这又根源于他的信仰,是他的信仰的实践。在他这里,“写作——生活——信仰”是合为一体的,他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完全投掷其中。这样,他的生命就进入了一个极其单纯的状态。我说巴金是一个“有信仰的、真诚的、单纯的人”,是我对“作为个体的人的巴金”的一种理解和把握,现在,我也可以说,这大概也是一代人的特征。

但这样的“信仰、真诚、单纯”是最容易被遮蔽的。这可以说是巴金一生的痛苦。就在我们引述的《灵魂的呼号》这篇文章里——写这篇文章时(1932年)巴金才27岁,他已经感受到了这样的痛苦:“我的名字成了一个招牌,一个箭垛,一面盾。我的名字掩盖了我的思想,我的信仰,我的为人。”而晚年的巴金依然没有逃脱这样的痛苦,或许还愈见深重:人们只知其“名”可用,而完全忽视了他的思想、信仰和为人,以至巴金不得不说,他是为利用者活着的。现在他终于解脱了。今天,我们如果真想纪念这位老人,就请记着他的信仰,恢复他的真诚和单纯吧,不

要让那些复杂而虚假的、与他无关甚至背道而驰的东西继续遮蔽他。

我们自己也要做一个有理想、有信念、有信仰的人。

信仰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大问题。在我看来，信仰的缺失，是当代大学生乃至中国年轻一代最大的问题。当一个人没有了理想、信念与信仰这样的精神动力，那么，他的一切行为的驱动力，只能是一己之私利，今天大学生中出现的许多问题，都是由此引发的。包括最近大家谈得很多的大学生、研究生自杀，这显然和缺乏精神的支撑有关。至于“如何重建信仰”，这是需要你们自己来解决的。我只能谈谈我的一些想法。同学们还处于在校学习的人生准备阶段，要为建立信仰打基础。因此，重建信仰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努力：一是通过自由读书，广泛吸取民族与人类文明发展所积淀的精神资源，滋养、培育自己的精神，打好精神的底子，这是主要的；二是适当参加社会实践，特别是沉潜到中国社会的底层，实地了解中国的国情，与脚下的这块土地，土地上的人民、文化建立血肉联系，这关系着一个人的生命的“根”，是需要一辈子努力的，但在大学阶段就应该有一个开始。在我看来，正在兴起的青年志愿者运动，就是一次大学生联合起来，在参与社会底层的变革实践中，培育新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建立新的信仰的有益尝试。

革命精神，青春激情

这几乎难以置信，巴金那个时代的许多青年人都是读了他的书而参加革命的。但这确是事实。有的读者在晚年回忆说：“巴金先生初期作品《灭亡》和《新生》给予我极大的启发和鼓舞，推动我努力争取投向革命的洪流中去。”（吴罗蕙：《回忆巴金先生》）

人们之所以觉得很难把巴金与革命联系在一起，是因为我们长期以来，都将革命理解为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。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，就可以看到更为阔大的革命景观。巴金是活跃于其间的。最近我看到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巴金的革命叙事与泉州 30 年代的民众运动》（作者：辜也平）。文章详尽介绍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的朋友，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福建泉州发动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市民的反抗运动的大量史实，而巴金的《爱情三部曲》就是以这些民众运动为背景的“革命叙事”，其中贯穿着一个“反专制，争自由”的主题——这其实也是巴金的人生主题。巴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他置身于这些革命者中间时的感受：“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，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，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。……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，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。我们的目标是‘群’，是‘事业’；我们的口号是‘坦白’。在那些时候，我简直忘掉了寂寞，忘掉了一切的阴影。”（《黑土》）前面我们谈到王安忆对巴金那一代人“急迫地要将自己献出去”的献身精神的向往；现在，我们终于明白，这样的献身精神是和他们的革命情怀联系在一起的。

我们不能把“革命”的含义理解得过于狭窄，革命不仅是直接的革命行动，也包括一切变革现实的实践。鲁迅就说过，“革命”也可以称做“革新”（《无声的中国》）。革命是和批判、反抗、变革、创造联系在一起的。我曾多次说过，革命的精神就是“独立的、自由的、批判的、创造的精神”。这就说到了巴金的无政府主义信仰。其实，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天生的革命者，因为他们怀着“消灭一切人压迫人、人奴役人的现象”的乌托邦理想，为了维护社会正义，对现实中一切有可能导致对人的压迫、奴役的现象，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，进行着永远的批判，永远的反抗。他们之所以反对一切权威、一切权力，是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权威与权力本身就有可能带来新的压迫与奴役。他们这种反对一切权威和一切权力的立场，使他们的理想带有很大的空想性，在实际生活中不但行不通，还可能产生消极的影响，这都是自不待言的。但其内在的“永远不满足现状，永远的批判”精神，却蕴含着一种“为了社会正义而永远革命”的精神。

鲁迅就多次提倡这样的永远革命精神。他赞扬孙中山先生“是一个全体、永远的革命者。无论所做的那一件，全都是革命”，他“一生历史具在，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，失败了还是革命；中华民国成立以后，也没有满足过，没有安逸过，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的工作。直到临终之际，他说道：革命尚未成功，同志仍需努力”（《中山先生逝世后一周年》）。鲁迅直到晚年还在召唤“真的知识阶级”，而“真的知识阶级”最基本的特征就是“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”，他们是永远的批判者，因此“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”；同时，他们“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，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”（《关于知识阶级》）。后来鲁迅赞扬巴金“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，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”（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），应该说不是偶然的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鲁迅在谈到大学生活时，特意强调在“探求学术”的“平静的空气”里，“必须为革命的精神所弥漫”。他提醒说，“否则”，大学就成了“懒人享福的地方”，“也还是无意义”，“不过使国内多添了许多好看的头衔”（《中山大学开学致语》）。——该怎样理解鲁迅的这一大学观？鲁迅的提醒对今天的大学还有没有意义？这些问题都应该好好想想。

我们还要讨论的是巴金和他那一代人的“青春激情”。这是一个标志性的特征，以至我们一提到巴金，就要想到他那句名言：“青春是美丽的。”我曾经说过，巴金的文学从根蒂上说就是青春的文学：他的文学的基本主题，是“青春的美丽与死亡”；他的文学的主要贡献，是为现代文学画廊提供了各种类型的青年形象；他的那样一种激情奔放的写作方式也是青年人特有的；他的明朗、流畅、率真、热情，活力四溢的文学风格更充满了青春的气息；更重要的是，他终生都在为青年写作，他“把心掏出来”，主要是向青年读者敞开心怀，进行心的交流。巴金是一天也不能离开青年的，这就是我听到同学们朗读巴金作品特别感动的原因：只要有年轻人在读他的书，巴金就是永生的。

令人惊叹的是巴金和他那一代人，终其一生都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激情和活力，真正做到了“永葆青春”。这是一个很高的人生境界、生命境界。这期间的“秘诀”是很值得探讨的。我想，这是和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一代人对理想、信念、信仰的坚守，胸襟的开阔，生命的纯净状态直接相关的：这是一代永远的“赤子”。用“星斗其文，赤子其人”八个字来形容巴金，恐怕是再确切不过的了。我们也因此在这一代人面前常怀羞愧之心：许多人早就“未老先衰”了。

“肯做苦工的人”

人们很容易就注意到，巴金是鲁迅扶柩人之一，他是鲁迅晚年比较亲近的年轻人。鲁迅说：“我和他们（指胡风、巴金、黄源等人），是新近才认识的，都由于文学工作上的关系，虽然还不能称为至交，但已可以说是朋友。”（《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》）——这个事实是颇值得琢磨的。

在1936年生命的最后一段历程中，有一个话题是鲁迅经常谈到且念念不忘的。3月，在写给友人的信中，鲁迅说：“中国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而我做得有限，真是不值得说的。不过中国正需要肯做苦工的人，而这种工人很少，我又年纪渐老，体力不济起来，却是件憾事。”（《致欧阳山、草明》）失望之情溢于言表。5月，在给一位老友的信中，他又迫不及待地报告：“近来有一些青年，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，不求虚名的倾向了，比先前的好用手段，进步得多；而读者的眼睛，也明亮起来，这是一个较好的现象。”（《致曹靖华》）到了这年6月，鲁迅又公开发表文章，表示“那切切实实，足踏在地上，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，我得引为同志，是自以为光荣的”（《答托洛斯基派的信》）。到了9月，在病重时写下的遗嘱里，他更是谆谆告诫：“孩子长大，倘无才能，可寻点小事情过活，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。”（《死》）

这是鲁迅一贯的思想：主张“足踏在地上”，为“现在中国人的生存”和发展做“实实在在”的事情、“小事情”，“不求虚名”。早在五四以后，他就号召年轻一代做“泥土”，“要不怕做小事业”（《未有天才之前》）。他身边团结着一批以未名社为中心的年轻人，鲁迅说他们“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，但是，愿意切切实实地，点点滴滴地做下去的意志，却是大家一致的”（《忆韦素园君》）。而鲁迅自己就是这样的实实在在地为中国的思想文化事业“做事情”的人，他自称“苦工”，常对许广平说：“我是一头牛，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奶和血。”现在，他体力不济了，不能再做“苦工”了，只能把目光转向青年，拼着最后的气力，高喊：“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。”这是非常感人而且具有震撼力的。

于是，就像当年的未名社一样，晚年鲁迅的身边又聚集了一批年轻人，而巴金就是其中的重要成员。鲁迅说到的“近年”出现的“很有实实在在的译作”的青

年,巴金应在其列。在我看来,这样的“实实在在”地做事的实践精神,是巴金和他那一代人的精神素质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。如我们这里所强调的,这是鲁迅那一代人所期待并精心培育的:正是在这里,显示了巴金这样的“五四之子”和五四传统的开创者的内在精神联系。

而就他们自身而言,这样的做实事的精神是和前面我们所说的高远的理想、信念、信仰相辅相成的:理想必须和实践结合,信仰必须落实到日常生活实践中;而小事情也只有为理想、信仰之光所照耀,才显示出背后的大关怀。

巴金就是这么做的,他自称是为信仰而写作的,他又和老舍一样自命为“作家”。他一辈子都在写——写书、翻译书、编书,他认为这是自己的本分、本职。他对别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期待,也只有两个字:“多写。”晚年,他对老朋友曹禺的忠告是感动、震动了许多人的:“丢开那些杂事,多写几个戏”,“少开会,少写表态文章,多给后人留下一点东西,把你心灵中的宝贝全交出来”。在我们这个时代,诱惑太多,社会风气太浮躁,要沉下心来实实在在做事情,很不容易。但巴金做到了,他们那一代的许多人都做到了,我们为什么做不到呢?

“想走进一个房间,却走进另一个房间”

当然,这一代人也有自己的弱点和困惑。

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,说巴金的“青春是美丽的”的命题还应该有一个反题作为补充,即“青春是可怕的”,因为和“青春”相联系的理想、激情有可能被利用,并且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。“文革”中的红卫兵在这方面就有惨重的教训。而巴金这一代人也不能避免这样的厄运:他们由于轻信而走上了迷信而自轻自残、自我奴化之路。这正是晚年巴金痛心疾首而一再反省的。

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,坦白地说,有些问题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,不过,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不能回避的:这一代人从反专制争自由出发,从反奴役争解放出发,最终是“想走进一个房间,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”。——这真是历史的大悲剧、大荒谬剧!没有比这更触目惊心的了!

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?如何从这样的奴化的可怕泥淖中挣扎出来?——这就是巴金和他那一代人所要面对的问题。

不难看出,这是一个令人痛心、使人难堪的复杂问题。正是在这里,巴金那一代人表现出空前的勇气和智慧,他们没有怨天尤人,没有逃避,也没有乞求于别人,而是自己来解决自己的问题,而且如王安忆所说,“不留情地指向了自己”,显示出难得的自我怀疑、自我反省、自我承担的精神。——在我看来,这正是这一代最可贵的精神。而今天我们在这里重读的巴金的《随想录》,就是这样的自我反省、承担,自我拯救的集中代表和体现。巴金以他特有的坦诚、真率,表达了

他的悔恨、自剖与反思，总结那一代的历史经验教训，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坚持说“真话”，坚持思想和创作的“自由”，坚持独立“探索”的权利。“真话”、“自由”、“探索”正是《随想录》的三个关键词。这样，他就最终将那一代人的苦难转化成了精神资源，既作为自我新生的精神支撑，又作为精神遗产留给了后代。我理解，他之所以力主建立“文革”博物馆，不仅是为了不忘历史，而且是要将这样的血铸的精神代代相传。

需要特别提出的是，巴金这一代在反思“想走进一个房间，却走进另一个房间”的惨痛历史时，并没有否定、改变自己的初衷，而是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，因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理想、信念和信仰。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一篇文章，它在《随想录》里并不显眼，但今天重读可能会别有意味。这是1985年巴金和一群小学生的通信。——我注意到这是1975年左右出生的孩子，大概是在座的各位的哥哥姐姐。他们在信中谈到了自己的困惑：在当今中国社会，“为金钱工作，为金钱学习，已经成为理所当然的事。这难道就是我们80年代的少年应该追求的理想吗？”“在理想问题上我们成了一只迷途的羔羊”，因此决心开展一个“寻求理想”的活动。他们想听听巴金爷爷的意见。巴金在回信中说，“你们并没有‘迷途’，迷途的倒是你们周围的一些人”，他强调这是“一场金钱与理想的斗争”，“我们绝不是旁观者，斗争的胜败关系到我们每个人的命运”。他还谈到了自己在30年代就树立了要把“更多的同情，更多的爱，更多的欢乐”“分给别人”的理想，“不这样做，我们就会感到内部干枯”；而“几十年来我走过很多的弯路”，“我经常感到‘内部干枯’的折磨”，“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，它有时离我很远，有时仿佛近在身边；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，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。有时我竭尽全力，向它奔去；有时我停止追求，失去一切。但任何时候，在我的面前，或远或近，或明或暗，总有一道亮光。不管它是一团火，一盏灯，只要我一心向前，它会永远给我指路”。他最后对这些小朋友说：“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，只要不停止追求，你们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。不用害怕，不要看轻自己，你们绝不是孤立的。”巴金说，这是“一个八十一岁的老人”的“回答”：他是永远和追求理想的年轻人心连心的。

20年后的今天，巴金爷爷已经远去，但我们在今天的会场上依然可以感到这样的心连心的温暖。

巴金曾把他的《随想录》比做“一只飞鸟”。他说：“鸟生双翼，就是为了展翅高飞。我还记得高尔基早期小说中的‘鹰’，它‘胸口受伤，羽毛带血’，不能再上天空，就走到悬崖边缘，‘展开翅膀’，滚下海去。高尔基称赞这种飞鸟说：‘在勇敢、坚强的人的歌声中你永远是一个活的榜样。’我常常听见‘鹰的歌’。我想，到了不能高飞的时候，我也会‘滚下海去’吧。”

今天到会的有冰心老人的女儿吴青女士，这使我想起了冰心仙逝时我写过的一篇短文。我说：“世纪之交的这个黄昏，翠鸟远飞了。但我仍在遥望，倾听。”

天际间，仿佛还闪烁着‘那不可逼视的翠绿的光’，仿佛还飘散着‘那动人的吟唱’……我的心格外的柔和，又有几分惆怅。”

老鹰滚下海了，翠鸟飞了，我们仍然留守在大地上。怎样面对我们的人生，我们的内心？我们将怎样生活，怎样做人？这是新一代人必须追问自己的问题。我很欣赏我们今天这个追思会的主题：“重读巴金，从《随想录》出发”。那么，就让我们从巴金所达到的高度出发吧，这位老人正在注视着我们。

（作者：北京大学教授）

“鲁迅精神”：家属与传播

■ 施立峻 夏中义

“‘鲁迅精神’：家属与传播”这一话题，是我在与周令飞先生的对话中形成的。周令飞是鲁迅长孙，现任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主任。他有一个心愿，就是想以鲁迅家属的身份，在2006年即鲁迅逝世70周年时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他想在这方面听听我的想法，既是咨询，也是交流。

(一)

鲁迅家属所期待的一个目标是：“如何让鲁迅活在21世纪的中国。”要害全在那个“活”字。按我的理解，鲁迅家属的那个目标又可被解读为：作为现代中国新文化象征的“鲁迅精神”，拟以何种形相，才能有效地渗入当下公众传播系统，而被国人（首先是中、小学生）所接受乃至普及。

应该说，就当下语境而言，鲁迅家属所预设的那个“鲁迅精神”之“活法”，不无新意。因为它有别于学界乃至思想界自1978年来重读鲁迅的那种还原型探索的路子。或者说，关于“何谓鲁迅”，长年以来，学院派的声音已不绝于耳，但鲁迅家属心中的鲁迅是什么模样，社会各界却从未耳闻。鉴于“鲁迅精神”不仅仅属于鲁迅，不仅仅属于鲁迅家属，而是属于中华民族，所以从中华民族的命运着想，鲁迅家属心中的鲁迅是怎样的，我想全民族都应有兴趣来倾听。

我甚至认为，在鲁迅逝世70周年之际，由鲁迅家属来申诉“鲁迅是谁”，这更应是一个能够感动中国的新闻事件。因为它将有助于国人日后能用更平和、更客观、更历史的眼光去还原鲁迅的本来面目。

(二)

诚然,我体会鲁迅家属郑重提出“如何让鲁迅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”,是有潜台词的。说白了,在鲁迅家属心中,鲁迅在自 1936 年以降的 20 世纪中国,已死了很久。此“死”不是指鲁迅的肉体生命,而是指其精神生命。其标志之一,便是在特定语境下塑造的鲁迅形象,已弄得连与鲁迅有血缘关系的鲁迅家属(比如长子周海婴,长孙周令飞)也颇陌生,不敢相认。这就是说,鲁迅家属所以要申诉“鲁迅是谁”,本是迫不得已的。当鲁迅被涂抹得离后裔记忆中、思念中的鲁迅相距太远,后裔当然有权质疑:这还是我的生父鲁迅或我的祖父鲁迅么?

不要小觑鲁迅家属对鲁迅形象“脸谱化”的反感,这不仅是因为鲁迅家属最有资格言说鲁迅性格的原生态,更是因为鲁迅家属的亲情反弹,委实蕴结一种对“鲁迅精神”的特定解读的价值殷忧。为什么自 1949 年以来有涉鲁迅的美术造型大多是“横眉冷对”?为什么多少年来亿万中、小学生从其语文教材读出的鲁迅大多过于冷峻、阴郁乃至僵硬?周令飞说,那是对“鲁迅精神”的解读有“空洞化”倾向。我更愿意说,这是一种“单向度化”。“单向度化”作为概念最早是马尔库塞提出的,其本意是指人被抽却其内心批判性维度,而让自己被体外某资本一权力意志牵着鼻子走。鲁迅当然不可能盲从世间的任何权威的声音。但这一历史事实并未保障鲁迅在其身后不被“单向度化”。其结果,便是“革命家”的鲁迅压倒了“文学家”的鲁迅,更压倒了作为儿子、丈夫、父亲和青年导师的鲁迅。最后竟荒诞到儿子不认识父亲,孙子不认识爷爷。

其次,这也解释了鲁迅家属在宣传与纪念鲁迅这个垂直系统,为何长年没有自己的位置。根子仍在于:“鲁迅精神”被公共话语“单向度化”了。既然鲁迅在其身后是因被命名为“革命家”后才走红当代中国的,既然鲁迅的“革命家”名份源自一段特定的历史,这势必导致仅仅与鲁迅有天然血缘的鲁迅后裔被边缘化。因为天然血缘所滋生的亲情,在当年语境,拟属一般人性,而“中国国情”曾几何时是更讲阶级性与政治性的。于是,在举国注目的纪念鲁迅的隆重仪式,鲁迅后裔屡屡成了“他者”。其荒唐大概不亚于如下小说场景:一伙强人突然破门而入,无端占据你的祖居,宣布他们才是户主,你靠边站吧。

(三)

“如何让鲁迅活在 21 世纪的中国”,鲁迅家属是可以有大作为的。其首要责任,当是重塑鲁迅形象,还原并复活鲁迅,要复活那个既存在于历史空间,又存在于家属记忆里的鲁迅,他有点神经质,有笑容,时而会恶作剧……总之,是活生生的。